

特邀專題

# 李金銓傳播研究遺產初探

陳韜文<sup>a</sup>

<sup>a</sup>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界，香港

## 摘要

本文從四個方面探討李金銓教授的治學遺產。首先，在社會科學研究範式上，他從解釋社會學的知識觀出發，強調將本土歷史脈絡與全球理論視野相結合。其次，在國際傳播領域，他致力打破美國中心主義以推動學科國際化，並對媒介帝國主義及國際傳媒如何建構多重現實，都有著深刻的實證分析與理論貢獻。第三，在政治傳播方面，他長期聚焦兩岸三地傳媒與政經權力結構的互動，精闢剖析各地的媒介管控模式與新聞自由的演變軌跡。最後，文章對李教授的學術領導能力及其他突出表現也有談及。

關鍵詞：華人傳播研究、國際傳播、政治傳播、新聞史、李金銓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新聞學研究、國際傳播。電郵：[jchan003@gmail.com](mailto:jchan003@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6年6月19日。論文接受日期：2026年6月23日。

---

Invited Special Theme Section

## **Professor Chin-Chuan Lee's Legac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Joseph M. CHAN <sup>a</sup>

<sup>a</sup>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cademic legacy of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in four regards. First, regard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s, he is disposed towards the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contexts with glob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econ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e was dedicated to breaking away from US-centrism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He made profound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media imperialism, and how international media construct multiple realities. Third,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e consistently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edia and political-economic power structur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providing incisive analyses of their respective media control models and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press

---

Joseph M. CHAN (Emeritus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mail: jchan003@gmail.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19 June 2026. Accepted on 23 June 2026.

*Professor Chin-Chuan Lee's Legac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reedom. Finally, the article also touches upon Professor Lee's academic leadership and other impressive traits.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history, Chin-Chuan Le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李金銓教授於2026年4月14日在台北辭世。他是國際著名傳播學者，更是華人傳播學界的泰山北斗。我在這裏想談的是我對李教授治學的幾點觀察，也算是對他學術遺產的一點初步整理。

我和李教授結緣很早。他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又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我們曾經共事，也曾合作研究和寫作。我很感恩和榮幸有機會和這樣一位真誠、嚴謹、博學多聞的學者保持長期亦師亦友的關係。我這裏的觀察是結合他的自述、著作和我們交往的經驗而作出的，希望不要偏離現實太遠。

我想談的有四方面：一是我對李教授傳播研究範式的觀察；二是他在國際傳播方面的貢獻；三是對他在政治傳播方面的貢獻；四是他在學術領導及其他方面的突出表現。為了較能具體說明，我會在以上每個研究領域選擇幾個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加以講解。因篇幅有限，好些優秀的研究也只能略去不提。

## 傳播研究範式的辯證取向

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對一個學者的影響重大。它代表著一種世界觀、界定何謂知識、何謂現實、如何研究、如何評價研究，以至甚麼是研究的典範。李教授自讀研究院起便一直非常自覺地建立他的社會科學研究範式，並將其應用於傳播研究之上。

李教授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五年，期間受過嚴格的實證訓練，對實證邏輯認識甚深。雖然李教授服膺實證主義的邏輯，但他強調他不是一個絕對的實證主義者，不以為社會科學有絕對客觀，可以透過量化手段找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精確規律(李金銓，2004、2019)。在這方面，他受到現象學和韋伯解釋社會學較深刻的影響：他認為社會科學有別於自然科學，不能忽略意義在社會的作用，也不能離開研究者的主觀詮釋，研究因而是主客觀的融合，是互為主觀(intersubjectivity)的過程。雖然他不追求社會客觀抽象規律，但他像韋伯(Max Weber)一樣，相信研究者可在歷史脈絡中找出因果聯繫和特定社會模式。

在這樣的社會科學範式指導下，李教授特別重視歷史脈絡的作用，認為它涉及社會變動的條件性，不可忽略。他不諱言自己是一個「脈絡主義者」，認為概念理論成立與否，以至個中評價，都必須放到具體脈絡中考察才能定奪。以「專業主義」為例，它的出現是有特定條件的，而它的解放或限制作用也可能因為脈絡不一而不同。

他認為社會現實是多元的、複雜的，有時更是矛盾的。他認為研究者的責任就是要找出它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並把它梳理整頓，並以「以序馭繁」的方式呈現之，有時更要以辯證的觀點加以概括。對他而言，看似對立的事物有時可能是一物的兩面，彼此可以相互轉化；又或者看似互相排斥的事物其實在不同的情景中也可分別成立，不一定抵觸。

李教授不愛宏大敘事的天馬行空，但對微觀研究的興趣也不大。他批評美國不少主流傳播研究在實證主義主導下變得支離破碎、理論貧乏、往往見木不見林。他鍾情的是中距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除了個人層次外，更考慮到社會機構和社會宏觀因素，看它們如何跨層次互動。

李教授極度重視傳播研究的主體性，認為提問應源自本土，解答也以本土的特殊性為依歸，不應被西方學術霸權牽著鼻子走，以複製西方研究為己任。不過，他也再三強調他反對義和團式的學術民族主義，認為西方的理論概念應有參考作用，不容忽視。他主張做研究應以歷史為經、以世界為緯：研究的脈絡是在地的，但概念理論的聯繫則是世界的。不管是本土或是世界，他反對的其實是任何故步自封的學術取向。

一個學者的研究範式自然有它的知識社會學，會因為師從、經歷、知性傾向、學術潮流、品味不同而有所變化，不應亦不能強求一致。李教授一向沒把他的學術觀強加諸於人。不過，這是他上下求索的歸結，我提出來是希望在探討李教授學術思想時多一個面向和參考。

## 重新界定國際傳播的取向

國際傳播是李教授終生關注的研究領域，於此貢獻良多。其一是他重新界定了學科的發展取向。他在2015年出版了《國際傳播國際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ee, 2015) 一書，主張國際傳播要排除美國中心主義，要實行國際化，引起廣泛的共鳴。在美國，國際傳播約定俗成的定義是：凡是關於美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傳播研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媒介與現代化的研究，都被視為國際傳播。這樣的界分標準純以美國為中心，而且也沒充分考慮學科的性質。若以研究的對象和範圍劃分，國際傳播所涵蓋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傳播、跨國比較研究和跨文化傳播。李教授認為國際傳播要做的是連接在地與全球視野，整合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他選擇繼續稱之為「國際傳播」而不是其他，主要是因為國家在跨境傳播中仍起著關鍵作用。根據這一定義，著名學者 Elihu Katz 的一些名著自是屬於國際傳播，應被視為國際傳播的經典之作。他也是因為李教授的鄭重說明，而公開承認自己也應算是國際傳播學的一員。

另一貢獻是他對媒介帝國主義的研究。文化帝國主義與國際資訊秩序一直是國際傳播的核心問題，是六十至八十年代最盛行的一個議題。為了能以實證方式探討相關問題，李教授把範圍縮窄至媒介帝國主義 (Lee, 1980)。文化帝國主義一說認為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勢力龐大，對它依賴的國家在文化上也會亦步亦趨。他以加拿大及台灣為例，發覺它們在政經上皆依賴美國，然而它們的電視文化卻因為文化保護政策而保有頗大的自主性，成了媒介帝國主義的異例。這意味著媒介帝國主義的假設並不完全對，至少在特定條件下並不成立。他承認自己受媒介政治經濟批判學派的影響，但他沒有把相關理論看成教條，反而是以它的結論作為研究的起點，從現實中審視它是否成立。今天重讀，李教授當時的理論化和分析工作確實做得十分徹底。他定出四個層次——電視節目來源、電視媒介擁有權、電視制度安排和外來文化價值滲透——來檢視帝國主義，在今天看來仍然適用。《傳播帝國主義再商榷》(*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是李教授的成名作，無疑是探討世界資訊秩序的經典之作。

另一值得一提的貢獻是李教授對國際傳媒建構多重現實的研究。他聯同我、潘忠黨和蘇鑰機 (Lee et al., 2001, 2002) 三位中大同事，趁數千外來記者 1997 年雲集香港報導回歸之際，深度訪問了七十多位來自八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並分析了他們回歸前後在電視及報章報導

的意識包 (ideological package)，從而歸納出他們報導的特徵及因由。我們發現他們的取向很不相同。例如，中國大陸傳媒強調回歸是洗脫百年國恥的日子，並歸功於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英國傳媒所突出的是對大英帝國光榮撤退的緬懷，褒揚英國如何把昔日漁村發展為國際大都會的功績；美國傳媒則擔憂香港回歸後會失去民主自由，大張旗鼓說唯美國有力量和道義責任保護香港回歸後的生活方式。這項研究清楚標示國際傳媒可就同一事件而生出多重現實。這主要是因各國的利益、外交政策和文化背景不一所致，同時也是記者馴化相關新聞的結果。所謂馴化，是指記者試圖拉近國際新聞與母國特定受眾的方法。比較研究一般是講多做少，此研究是對國際傳播中的內容及其生成過程的大型比較研究，無論是探究範圍及深度，應是一時無兩。

## 傳媒與權力共舞的多樣形態

政治傳播方面，李教授絕大部份研究都是以傳媒與權力結構互動為研究核心。其實，就算是在國際傳播和新聞史方面的研究，他關注的焦點也是一樣。他通常會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深入分析兩岸三地新聞自由的發展 (李金銓, 2004、2022)。他兼顧政治、經濟與文化對傳媒的影響，也留意傳媒的相對自主性及對權力中心的反作用力。下面是李教授在政治傳播方面較具典範意義的研究。最後一項也可歸類為新聞史研究。

中國大陸方面，他關注記者和媒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角色演變，特別是中國在市場化下的媒介控制方式的轉變。市場化是中國大陸開放改革政策的關鍵措施。傳媒本來純是黨的事業單位，不問營利。但隨著中國進入世貿及經受市場化的洗禮，大部份傳媒都要面對集團化和市場競爭。如何界定中國傳媒在市場化環境中新的管控模式？李教授聯同何舟及黃煜二位，透過深入訪問上海傳媒管理人員，並對比世界多種媒介組織形態，從而概括出中國傳媒的管控模式為「黨國市場統合主義」(party-market corporatism) (李金銓, 2022；Lee et al., 2007)。他們辯證地把政治權力與市場誘因連結起來。他們還從上海、廣州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北京的差異處細分出三種管控形態：一是以上海為代表的「侍從結構」(clientelism)，二是以廣州為代表的「政治管理市場化」(marketisation of political management)，三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市場化的政治吸納」(political absorption of marketisation)。這些概念頗富解釋力，是他們琢磨良久的成果，無疑為集權式傳媒體制變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

對李教授而言，香港像個社會實驗室，從中可以看到各種權力與傳媒共舞的形態。他最關注的是香港新聞自由如何受到權力變遷的影響(李金銓，2004、2022)。他與我(李金銓，2022；Chan & Lee, 1991)曾在回歸前定出分析新聞範式如何因應權力更迭的框架，探討香港不同類型的報紙如何看待中英兩個權力中心此消彼長的關係。此後，他繼續探討「自我審查」和「專業主義」的表現(李金銓，2022；Lee, 1998)。他發覺自我審查的範圍十分廣泛，不少新聞人員和傳媒都有刪除、稀釋、扭曲或改變新聞重點的現象。同時他也發覺新聞人員傾向把專業主義的「策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s)化為保護自己的防火牆，以圖減少被責難的風險。到2020年後新聞運作的環境變化，他也已把個中趨向納入他的分析。李教授就香港的媒介政治做了大量研究，無論是在實證或理論概念方面的貢獻，無疑都十分巨大。

台灣方面，李教授最感興趣的是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互動的歷史(李金銓，2022；Lee, 1993, 1994)。他從台灣政治經濟的文化矛盾出發，認定爭取新聞自由乃是應運而生之舉：國民黨政權一方面要面對國家認受性的挑戰，同時卻進行新聞、文化控制；知識份子和反對派自是要開創言論空間，利用政論雜誌來宣傳理念和組織動員。所以，這基本上是他對台灣爭取新聞自由的研究，特別關注小媒介——政論雜誌——如何顛覆權力結構的作用。他搜集當時能有的資料，對台灣的白色恐怖、新聞審查制度、反對勢力和政論雜誌的興起、以至開放報禁都有深入細緻的分析。這項研究對台灣的意義固然重大，它也為我們了解發展中國家傳媒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

新聞史是李教授2010年代才開始著力的新領域。不過，他的取向有別於傳統新聞史常見的毛病：缺乏問題意識、概念貧乏、方法不明、流水賬式，和重政治褒貶。他引進社會科學理論，以重要的提問

帶動，並嚴謹對待資料及概念的闡釋。其中一項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是他以蕭乾、陸鏗、劉實雁三人的記者生涯來考察不同記者如何與報社及時代互相交錯(李金銓, 2013)。他們的迂迴道路折射出中國自民國以來時代的轉接，新聞處境由「文人論政」過渡到半專業化或黨化年代。李教授認定出名記者也要進入適當的報社才能充分發揮才華。近代中國亂局頻仍，記者及報社的社會功能極不穩定，不時因權力消長而更變。跨層次分析是社會科學看重但少見的研究取向，李教授卻在此研究中把記者、報社及時代三者緊密扣連起來。他們互動的歷史跨度長，過程迂迴曲折，但李教授能做到以序馭繁，煞是難得。

## 學術領導及其他

除了以上學術直接的貢獻外，李教授尚有其他間接而相關的突出表現，對我們不無啟發意義，故借此順道一說。

一是李教授的學術領導作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創造平台以推動學術發展的能力。他擅長搞專題會議，召集相關研究者發表論文，最後結集成書，並附上長篇序言作綜合闡釋之用，再交由有聲譽的出版社出版，以至在學界產生迴響。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主持「中國時報媒介與社會研究中心」(China Times Center for Media and Social Studies)就以此方法出了四本關於文化中國傳播研究的專書，起到歷史性的作用。其後，他在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召開國際傳播國際化會議和兩次新聞史會議，也都引起重大反響。李教授示範了如何持續建立平台推動帶領學術的發展。不過，隨著時代環境的改變，建立此等平台的方式也可能改變，不能完全照搬，要因時因地制宜。

李教授熟悉中、港、台、美四個國家/地區的社會脈絡，加上他也熟習比較研究邏輯，故此他不時透過橫向或縱向比較，從而得出深刻的觀察、洞見和概念。他常常強調比較意識的重要性，我相信此種意識已滲透在他日常的分析觀察中。例如，當他說到台灣媒介管制方式時，他以中國大陸的「鎮壓」和香港殖民地的「籠絡」，來對比台灣戒嚴時期的「收編」政策(李金銓, 2022)。經他這樣一說，我們對控制形態的多樣性又多了一重認識。他這種比較意識應該不是天生的，是培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出來的。我們大概都可以從李教授的經歷中獲得啟發，培養自己的比較意識。

李教授終生好學不倦，特別受到一些學者的影響，往往視他們為「老師」。除了他自己獲得教益外，他也不忘向同儕後學推介他的「老師」。他承認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對他影響終生，對他如何選題、如何研究以至如何寫作都有無比的幫助。Thomas Luckmann的社會建構學說、Clifford Geertz關於意義網的文化現實觀、Max Weber的解釋社會學、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研究批評理論、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論等等都是他經常道及的學說。這些「老師」不涉面授，是李教授自學得來。他沒有奉他們為真理的化身，但他覺得他們是靈感的源泉，是有用的學術對話人。當然，每人選擇的老師可能不一樣，但李教授這種好學、虛心請益多師的做法對我們不無啟迪作用。

作為一個研究者，特別是國際傳播學學者，李教授常常提出局內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觀點矛盾的問題(李金銓，2019)。他沒有特別偏向誰的觀點，認為要辯證地看待二者，最後都要經過互為主觀的融合過程。李教授原籍台灣，留學美國，在香港逗留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後便對香港和中國的傳媒產生研究興趣，後來更成為他一生的研究對象。他除了自己獨自研究外，有時也聯同其他在地研究者合作以補其不足。究竟李教授的觀點是局外的或是局內的，到後期應難以確定，因為透過研究、長期生活和交流，他已兼具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觀點。現代生活中，我們去「異地」教書工作的機會應有不少。如何投入在地研究，如何熟識局內人觀點，自是一個問題。同樣的問題在做跨國或跨地比較研究時也會出現。李教授的取向和經歷對此也應有參考意義。

## 結語

簡單地說，在社會科學研究範式上，李教授受到實證邏輯的影響，同時兼具解釋社會學的知識觀，強調將本土歷史脈絡與全球理論

視野相結合。李教授不少研究都帶有這些特徵：不尚空談、重提問、重證據、重邏輯、重脈絡、中觀的、歷時的、辯證的、比較的、以序馭繁的。這些特徵看來並非出於偶然，而是跟他的研究範式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

李教授最關注傳媒與權力結構的互動關係。這個焦點貫串著他在國際傳播、政治傳播和新聞史多方面的研究。在國際傳播方面，他重新界定學科研究的取向，並提供了嶄新的研究典範。在政治傳播方面，他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深入剖析兩岸三地媒介的歷時變動，積累了大量重要的學術文獻。幾年前，當他的病情放緩時，他還相約我和蘇鑰機研究香港新聞自由的驟變，可惜最後因病情反覆而擱置，由此可見他對新聞自由和學術研究的終極關懷。

李教授著作等身，是華人傳播學界一代宗師，又是享譽國際的傳播學者，影響深遠。他無疑成就非凡，但他的態度是謙虛的，常常說他明白「學問實難」的道理，自己只是盡其在我而已（李金銓，2019）。他以真誠、開放的態度對待學術，不認為自己的學說是甚麼金科玉律，自然是可討論、批評的。

我在這裏只能對李教授的學術遺產作出粗略的整理，其精深處還有賴各方發掘補正。

##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研究項目經費資助。

## Funding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 ORCID

陳韜文 (Joseph M. CHAN) <https://orcid.org/0000-0003-3961-394X>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李金銓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牛津大學出版社。
- Lee, C. C. (2004). *Beyond western hegemony: Media and Chinese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李金銓 (編) (2013)。《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Lee, C. C. (Ed.). (2013). *To serve the nation: Journalists as prisms of Chinese press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李金銓 (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Lee, C. C. (2019). *Crisscross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Linking Publishing.
- 李金銓 (2022)。《新聞自由的幽靈》。時報文化出版社。
- Lee, C. C. (2022). *The specter of press freedom*. Reading Times Publishing.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p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Guilford Press.
- Lee, C. C.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Sage.
- Lee, C. C.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28, 163–200.
- Lee, C. C. (1994).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In C. C.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pp. 163–201). Routledge.
- Lee, C. C.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of Press and Politics*, 3(2), 55–73.

- Lee, C. C. (Ed.). (2015).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e, C. C., Chan, J. M., Pan, Z., & So, C.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and Politics*, 12(3), 21–42.
- Lee, C. C., Pan Z., Chan, J. M., & So, C. Y. K. (2001). Through the eyes of U.S. media: Banging the democracy dru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2), 345–365.

## 本文引用格式

陳韜文 (2026) 。〈李金銓傳播研究遺產初探〉。《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77 期，頁 229–241 。

##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an, J. M. (2026). Professor Chin-Chuan Lee's legac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7, 229–241.